

自由主義的新遺產

殷海光

夏道平

徐復觀

政治經濟文化論說

何卓恩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3036321

D693.71
12

自由主义的新遗产

殷海光

夏道平

徐复观

政治经济文化论说

何卓恩 著



北航

C1643851

D693.71

15383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政治
经济文化论说 / 何卓恩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108 - 1239 - 2

I. ①自… II. ①何… III. ①知识分子 - 研究 - 台湾
省 - 近代 IV. ①D693.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2655 号

自由主义的新遗产

——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政治经济文化论说

作 者 何卓恩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 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1239 - 2
定 价 38. 00 元

自序

本书是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三位赴台哲人的合论。将这三个人物合并在一起加以讨论，有两个理由。

一是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我一个研究项目，题为“湖北赴台哲人研究”，湖北赴台哲人很多，陶希圣、胡秋原、徐复观、殷海光、夏道平等都是，我就选取自己比较熟悉的殷、夏、徐三位，作为个案加以考察。这算“外在理由”。

二是殷、夏、徐三位不仅都是哲人，并且都对自由主义有过深入思考，各有超越于以往自由主义的新成就，将他们结合起来讨论，意义就不仅仅是“湖北赴台哲人”的随意性案例了。这算“内在理由”。

我进入思想史阅读和研究只是10年左右的事，属半路出家。以前兴趣比较杂，大学本科读的政治学，毕业后热衷文化哲学，后来工作需要进修过经济学，都浅尝辄止，不得要领。直到受单位派遣进入历史学硕士学位班，因为学位论文写作需要，才结合自己学业基础确定研究思想史；到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才更进一步将研究领域集中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方面。

我的博士论文试图以一个典型人物为观察点，溯及源流，上下连贯，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演变作出尝试性考察，选取的人物是1949年去台湾而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殷海光。对殷海光进行一番阅读和探讨，即始于此。2002年博士论文完成，经修改两年后在上海三联书店付梓，书名《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本书中《殷海光从三民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演变》一文，可说是该书一章的压缩版，曾作为讨论三民主义的论文提交给一次纪念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

该书出版之前，得益于台北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和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帮助，我有幸亲赴台湾补充资料和访问前辈，期间荣获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约稿，因此写出一篇《办教育与办政治：殷海光政教关系认识的变化》，将书

中提到而没有展开的殷海光对政治与教育关系问题的认识做了专题考察。大致同时，又写了一篇《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的思想进境》在内地刊物上发表，针对学界关注的殷海光晚年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的思想变化做了若干探索。

此后一段时间，因为从事博士后研究，将研究对象调整为1950年代在台湾的整个自由主义群体，也就是《自由中国》同人的整体思想倾向，有关殷海光个人思想的专题研究暂时放了下来。在台湾水牛出版社出版的出站报告《〈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一书中，殷海光虽仍占有一定篇幅，内容上却并无明显延伸或深化。后来参加一些专题研讨活动，才又继续讨论到有关殷海光思想的一些内容。本书中的《民本与民主：1950年代殷海光经历的两场论战》、《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等文章，就是这样写出的。

在讨论殷海光思想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他的道友夏道平和论敌徐复观。

说夏道平是殷海光道友可谓千真万确，这不仅仅是说他们同属《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同为该刊主笔，共同为该刊撰写言辞犀利的社论，而且《自由中国》停刊后，他们也一直坚持思考自由主义理路，并常在一起交流讨论。殷海光思考的重点在民主政治层面，但也触及自由经济；夏道平思考的重点在经济自由层面，但也始终不离民主政治的目标。夏道平1950年代的思想在《〈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一书中已经有所反应，最近几年，两岸对夏道平思想价值的认识也在增多，2007年夏先生诞辰100年，两岸都举办了纪念性的学术会议，我都参加了，而且大陆的会议是我与夏先生长孙湖北经济学院夏明教授共同推动的，还在《湖北社会科学》出了一个专号，所以有机缘做出几篇小文，本书收录的《自由与平等：〈自由中国〉时期殷海光、夏道平对政经关系的反思》、《夏道平对市场经济的证成》、《秉持市场经济理念的三位鄂籍经济学家》等文均与此有关。《夏道平论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则是略早写给台湾《经济前瞻》的一篇文章。

说徐复观是殷海光论敌则真假参半，确切而论应该是亦敌亦友，以友为主。他们的大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实现民主政治和落实文化自由创造，所不同的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徐复观从来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又说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

自由主义政治结合起来，这与殷海光一度以政治民主为中心对传统文化展开激烈批判是不同的。对于徐复观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在《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和《〈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中皆有涉及，最近完成的一个研究项目“大陆赴台学人与台湾光复后的文化重建”，则列专门章节做了一些讨论，本书《徐复观、牟宗三与新儒家在台湾的兴起》和《徐复观与牟宗三思想的比较》即出自此项目。专门的文章《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徐复观与殷海光的思想合离及其启示》，是前几年参加徐复观思想研讨会时撰写的。

这些讨论都围绕自由主义思想而展开，三位先生的人生际遇、生平事迹和纯学术性的专业领域，我始终没有花太多精力去做考释。实际上，这些应该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对解读各自的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对殷海光，最近刊出的一些资料，揭示出若干重要事实需要进一步厘清。如李文熹的《殷海光故家的几件往事》（《书屋》2007年10期）、《关于“殷海光故家的几件往事”的补正》（《书屋》2011年2期）等文章，对殷海光的家世、家人后来的遭遇，做了详细的说明，提出殷海光的出生时间应为1916年而非其自述的1919年的观点，留下了殷海光何以自改生年的疑问。台北新出版的《殷海光夏君璐书信集》（台大出版中心，2011），呈现了大量原始历史资料，足以反映殷海光早年的心态，学术和政治的倾向，学界存疑的金陵大学副教授身份、蒋介石召见时间、《赶快收拾人心》等文章发表的背景和社会反响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证实或证伪。对夏道平、徐复观也有一些资料的披露。这方面的研究，只能留待日后来弥补了。

本书既然都是从自由主义这一视角所做出的观察，势必会触及到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的评估。这方面这些年我写过几篇文字，最早是2004年发表的《自由主义的中国性格》短文，蒙高瑞泉教授指教，希望结合中国社会具体语境略加展开，近期改出修订稿，就是收在这里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旧传统与新遗产》，算是本书一篇略近结论性的文字。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传统？这对我既有前述偶然因素，也经过一些思考。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思想文化始终左右着文明的方向。在传统时代，儒墨道法四大思潮以及西来佛教各领风骚，而儒学居于主流；进入全球化时

代，传统思潮受到挑战，耶教东来，世俗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大世界性思潮也分别被知识界引进中国，作为救亡妙方。我曾试用“从常变之争到主义之辩”来描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基本线索，当“主义之辩”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显著表征时，三大新型思潮各自如何落地生根，如何处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的结合，如何争取成为主导价值，塑造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就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后中国大陆学界的显学一直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思潮在中国的演进，有着最大规模的探讨；而1978年后大陆学界因应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需要，又开始对民族主义进入中国的历史展开全面研究，出现一大批研究成果；唯独自由主义思潮，左倾时期是学术禁区，开放以后仍深觉敏感，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由于三大思潮是在互动中演进的，自由主义研究的滞后，不仅有碍于对自由主义中国命运本身的了解，而且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研究的深化。

由于三大思潮研究的不平衡，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主义之辩”中最含混的一种思潮。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研究少而结论多，如中国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散漫，中国自由主义是弱小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中国自由主义脱离人民，中国自由主义反传统，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中国自由主义者不爱国，自由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等等。这里其实许多是似是而非的认识，最需要正本清源。

另一方面，从世纪历史发展看，自由主义应该也是与中国命运与前途关系甚巨的一种思潮，不容忽视。1978年后，教条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宣告破产，继之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最明显的是民族主义内容融入社会主义若干原则之中。这一路线在过去三十年的实践中显示了巨大的活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国令世界刮目。但随着国力的强盛，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矛盾日益显现，公民人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思想统一与文化自由的不协调日益扩大，维稳的负担越来越大。国民面对国际问题的非理性倾向也给政府的正常国防和外交造成压力。这似乎表明仅仅民族主义不足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特色”还需要汲取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元素，比如人权意识、法定自由意识、社会多元意识、理性精神、民主法治等。只有这些原则与民族主义结合，才能真正

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健全的内涵和持久的生命力。

我参与研究自由主义，基本的考虑在此。而选择着力于考察 1949 年以后台湾地区的自由主义发展，乃因这是 20 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演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与以往自由主义在大陆发展有所区别的部分，且是常常被遗忘的一部分。迄今为止，大陆学者对于 1949 年以后赴台哲人在台湾的思想发展，尤其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关注和研究仍然凤毛麟角，特别需要加强。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三人思想未必能够代表自由主义新传统的全部，但应该足以代表自由主义的与时俱进。

本课题还邀请了三位朋友参与，他们是湖北经济学院夏明教授、武汉理工大学邓文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刘金鹏副教授。很荣幸，他们的成果也被允许收入本书。夏明教授是夏道平先生嫡长孙，《夏道平的“自由经济传道者”之路》是其根据曾发表在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刊的纪念祖父文章改定的；邓文副教授是我曾经的同事，近年也对赴台知识分子发生兴趣，并以“雷震与战后台湾社会运动”为题完成其博士论文，期间也探索过其他赴台思想人物，本书中的《夏道平对自由的厘定与阐发》为其提交给纪念夏道平研讨会的文章，在学术期刊发表过。刘金鹏副教授研究新儒家人物多年，他专门为本书撰写了《徐复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阐释》一文，并三易其稿，令我格外感动。这些朋友的慷慨，为本书增色不少，激励我不避浅陋，抛砖引玉，很感谢他们。

2012 年 11 月

目 录

楔子 赴台湖北文化名人	(1)
第一章 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概说	(11)
第一节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	(11)
一、“五四的儿子”：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	(12)
二、“自由思想者”	(16)
三、跨越时空的身影	(25)
第二节 “自由经济的传道者”夏道平	(27)
一、秉持市场经济理念的三位鄂籍经济学家	(27)
二、夏道平的“自由经济传道者”之路	(32)
第三节 “勇者型新儒家”徐复观	(38)
一、新儒家之路	(38)
二、勇者型的新儒家	(41)
第二章 政治哲学家殷海光	(49)
第一节 从三民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演变	(49)
一、三民主义理念认同	(49)
二、三民主义重心的游移	(52)
三、逸出三民主义	(55)
四、与三民主义合离之因缘	(59)
第二节 办政治与办教育：殷海光政教关系认识的变化	(63)
一、抨击“职业学生”、认同党化教育时期	(63)
二、反对训练式党化教育、向“新教育”转折的时期	(69)

三、全面否定党化教育、主张民主科学教育的时期	(72)
四、结论	(77)
第三节 民本与民主：1950 年代殷海光经历的两场论战	(79)
一、殷海光与张其昀之战	(80)
二、殷海光与徐复观之战	(84)
三、两场论战留下的思考	(89)
第四节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的思想进境	(92)
第五节 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98)
一、“五四之子”的“五四”情结	(100)
二、前“五四之子”的“五四”印象	(102)
三、“五四之子”的“五四”观	(105)
四、“隔离的智慧”中的“五四”观反省	(111)
第三章 经济哲学家夏道平	(117)
第一节 自由与平等：《自由中国》时期殷海光、 夏道平对政经关系的反思	(117)
一、终生坚持自由理念的两支健笔	(117)
二、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以往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信念	(120)
三、殷海光、夏道平与《自由中国》的政经关系反思	(122)
四、《自由中国》整体认知基调的转变	(129)
五、“理知的自由主义”	(131)
第二节 夏道平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证成	(135)
一、漫长的探索	(135)
二、经济学的方法和心态	(136)
三、经济学的出发点	(138)
四、两种秩序	(140)
五、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	(141)

目 录

附：经济学人的三种类型——夏道平的“经济学家”论	(143)
第三节 夏道平对自由的厘定与阐发	(147)
一、自由的本质规定性	(148)
二、经济自由	(150)
三、政治自由	(152)
四、文化自由	(155)
第四节 夏道平论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	(157)
一、夏道平一篇论述宗教的文章	(158)
二、自由、理性与宗教	(161)
三、当代思考	(165)
第四章 文化哲学家徐复观	(169)
第一节 徐复观、牟宗三与新儒学在台湾的兴起	(169)
一、《民主评论》的创办	(170)
二、“人文友会”	(176)
三、《中国文化宣言》	(181)
第二节 徐复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阐释	(187)
一、反思近代中国的文化论争	(187)
二、揭示中国文化的民主自由精神	(192)
三、阐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198)
第三节 徐复观与牟宗三思想比较	(210)
一、牟宗三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210)
二、徐复观“以破显立，去芜存菁”的学术进路	(216)
第四节 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徐复观和殷海光的 思想合离及其启示	(227)
一、自由主义政治论述的契合	(229)
二、自由主义与儒学关联性的分歧	(233)

自由主义的新遗产

三、思想敌友之心路渊源	(239)
四、思想合离中的双向反省及启示	(246)
代结语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旧传统与新遗产	(253)
一、自由主义的中国语境	(254)
二、自由主义的中国性格	(256)
三、中国自由主义的“旧传统”与“新遗产”	(261)
附录 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年表	(265)
一、殷海光年表	(265)
二、夏道平年表	(268)
三、徐复观年表	(274)
后记	(279)

楔子 赴台湖北文化名人

战后台湾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鄂籍知识分子作出了特别的贡献。赴台湖北文化名人研究是拓展湖北形象传播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发展鄂台关系的一个潜在领域。

一、重“推广”轻“构造”：湖北形象传播力的失重

形象传播力是一种软实力，通常指一个主体（国家、地区、城市、企业、个人等）通过媒体、人际沟通、宣传公关等各种传播渠道来影响和改变人们对其印象的能力，体现为一个主体对其整体形象体系的构造能力，传播和推介的水平和力度。形象传播力强，一个主体的知名度就会迅速提升，而且这种知名度更主要与美誉联系在一起。

湖北形象传播力当然是塑造和推广湖北地区良好形象的一种能力。由于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忽略形象传播，湖北在海内外的正面形象远逊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重庆等省区。据报道，七成网民认为湖北形象不清晰。^① 而在这不清晰中，又有“斗狠”、安于现状、精明却缺少大智慧、缺乏合作精神等负面形象的影子。虽然不少人士绞尽脑汁为“九头鸟”说法求新解，因主要在字面上下工夫，负面形象仍得不到有效纠正。近年，湖北省开始着眼于以开放先导战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展示湖北的壮丽山川，展示湖北人文精神，展示湖北发展优势，以提高湖北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湖北良好形象。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先后发起“诚信湖北”演讲比赛、“五个一批”（一批文明诚信公民、一批文明诚信企业、一批文明诚信窗口单位、一批文明诚信执法单位、一批文明诚信企业家）评选表彰等“做文明公民，树湖北形象”主题教育

^① <http://news.cnhubei.com/gdxw/200904/t639246.shtml>。

活动；省广电台站与相关名产企业合作举办“美丽湖北”形象大使评选等活动；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省广电总台、省旅游局等部门联合主办“唱响湖北、歌扬天下”歌曲征集、歌咏比赛；相关媒体还制作了《湖北形象宣传片》，通过海内外各种载体立体发布；荆楚网则推出“湖北形象调查问卷”，征求广大网民的意见、建议。应该说，这些举措在不同程度上彰显了湖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不过，上述举措的侧重点，基本都放在推介上；形象体系内涵方面的创新，显得不足。兹以“湖北形象调查问卷”为例：在“您认为最能代表湖北的文化标识是什么”问题里，提供的备选，是神农炎帝、楚文化、凤凰、九头鸟、惟楚有才、知音文化、编钟，没有提到汉治萍；在“您认为最著名的湖北历史人物是谁”问题里，提供的备选是屈原、王昭君、毕昇、李时珍、张居正、陆羽，没有提到熊十力；在“您认为最能代表湖北的地理标志是什么”问题里，提供的备选是黄鹤楼、九省通衢、千湖之省、神农架、武当山、三峡工程，没有提到红楼；在“湖北人文精神的核心”问题里，提供的备选是“一鸣惊人”、“敢为人先”、“兼容并蓄”、“筚路蓝缕”，没有提“思想创造”；在“对于湖北整体形象的提升，你认为最需要强化哪个方面”问题里，提供备选的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正面宣传湖北”，“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和全省性文艺活动品牌”，“组织对外宣传和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提炼和培育湖北人文精神”，没有提到开发尚未充分引起外界关注的有内涵的湖北形象元素，重组湖北形象构成系统。形象传播如果没有新的形象内涵，完全“吃老本”，纵然推广力度很大，推广效果也不容乐观。

有鉴于此，开发尚未充分引起外界关注的有内涵的湖北形象元素，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重构湖北形象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战后赴台湖北文化名人

如何拓展湖北形象的内涵，是一个带有根本战略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集合各种力量反复研讨的问题。其实，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来说，湖北文化名流辈出，像顾景星、余三胜、余叔岩、杨守敬、谭鑫培、王葆

心、田桐、熊十力、黄侃、詹大悲、李四光、闻一多、废名、胡风、王亚南、曹禺、叶君健、秦兆阳等，都是需要挖掘和阐发的重要形象资源。如果有一个系统的湖北近现代名人推广计划，这些文化名流的流芳溢彩，必将有助于湖北新型文化形象的确立。

湖北文化名流中，还有一群被遗忘的“异军”，那就是以特有的湖北人文精神，对至今尚未统一的台湾地区的社会进步作出特殊贡献的一批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战后台湾人文社会，牛耳湖北文化人士执掌。略具数例：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王世杰（1891－1981），崇阳县人。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台，先后出任“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委”。1981年病逝前立下遗嘱，将其一生所收藏的所有字画书籍赠与武汉大学，台湾学界誉之为“永远的武大校长”。

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896－1979），钟祥人。1948年去台湾，先后被推选为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任台湾大学教授，为考古人类学系主办人。其著作《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等，被两岸学人奉为经典。

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沈刚伯（1896－1977），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人，赴台前先后任湖北省教育厅秘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1948年应聘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并代理教务长。1950年11月，台大校长傅斯年病故，沈代理台大校长至次年四月。1954年，与在台历史学家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任首届理事会理事长。1957年与李济共同主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1965年应聘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一年，1970年当选台“中央研究院”院士。有《沈刚伯先生文集》传世。

著名教育思想家余家菊（1898－1976），黄陂县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乡村教育、新式学校军事训练的倡行者和理论构建者，国家主义理论家。1948年底赴台湾。著作主要有：《国家主义概论》、《中国教育史要》、

《孔子教育学说》、《孟子教育学说》、《荀子教育学说》、《陆象山教育学说》、《教育与人生》、《人生对话》、《中国伦理思想》、《大学通解》、《余家菊先生回忆录》等。

著名社会史学家陶希圣（1899－1988），武汉市新洲区人。1949年前已经是著名学者，著有《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书，主办著名杂志《食货》。抗战期间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赴台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著名思想史家、思想家、政论家徐复观（1903－1982），浠水县人。1949年赴台，承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弃政从学，著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艺术精神》、《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等，力图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另创办《民主评论》批评时政，集结新儒同道。他对威权的批评锋芒丝毫不亚于自由主义批评家，在台湾留下永恒的历史记忆，被誉为“勇者型的新儒家”。

著名经济思想家、政论家、翻译家夏道平（1907－1995），大冶人，1949年到台湾后担任《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后来先后任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等院校教授和“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他以数十年心力，在华人世界第一个系统地翻译了现代市场经济经典名著，包括：米塞斯的《反资本主义的心境》，《经济科学的最后基础》，《人的行为》，海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洛卜克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等十余部著作，无论从系统性、完整性上讲，还是从专业性、完美性上讲，都堪称严复以来西学东渐、中外文化会通的又一重镇。他也是华人社会对经济体制思考较早，对市场经济的价值认知较深的先驱，著有《我在〈自由中国〉》、《自由经济的思路》、《自由经济学家的思与言》等书。

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胡秋原（1910－2004），黄陂人。1949年以立法委员身份赴台，之前已经著作等身。赴台后历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中华杂志》发行人，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留下

100 多种 3000 余万字的著述。1988 年他毅然首访大陆，因此被李登辉开除国民党党籍。1989 年，美国传记学会将其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奖。2004 年 5 月 4 日，94 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

著名经济学家邢慕寰（1915 – 1999），黄梅县人，1949 年赴台，台湾大学商学系教授，中研院院士，对台湾、香港经济界和学术界贡献至巨。在台湾经济学界学术成就也是最高的，是第一位在国际七大顶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1918 – 1993），应城人，1948 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中研院院士，“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他的经济市场化理念被主持经济工作的尹仲容接受，得以在政策中加以贯彻，使得台湾迅速走向经济起飞，创造了举世共知的“经济奇迹”。大陆改革开放后，曾赴内地访问交流。因对台湾经济改革贡献极大，1982 年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中国人。

著名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殷海光（1919 – 1969），团风县人。1949 年以《中央日报》主笔、《民族报》总主笔身份赴台，后离开国民党任教台湾大学，加入《自由中国》阵容并任主笔，成为民间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精神领袖。有《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思想与方法》、《旅人随记》、《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1000 万左右的文字问世，其中《中国文化的展望》后来流行于台、港、陆三地，有重大学术影响。除留下传世著作之外，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今天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如林毓生、张灏、陈鼓应、李敖、韦政通、林正弘、瞿海源等。台湾解严后，1989 年成立了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每年均有纪念他的学术活动。转型后的朝野两大党均对他在威权时代的思想学术贡献公开表达推崇。他在大陆的影响也正在扩大，南京大学还设立了“殷海光逻辑奖学金”。

著名作家聂华苓，1925 年生，广水市人。1949 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曾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台湾大学、东海大学等校副教授。1964 年赴美。出版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及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等。作品以深邃的历史感表现现代中国的沧桑变化，抒写台湾中下层人们的乡愁和海外浪子的悲歌，以“溶传统于现代，溶西方于中国”的艺术风格征服了世